

司机停车等让座是“道德绑架”

日前,常州市本地论坛出现一则热帖,网民“阿木是我”发帖反映,上周五下午,在常州一公交上,一女子抱着小孩却无人让座,司机无奈停车7分钟!(12月24日中国新闻网)

妇女抱孩子上公交,因无人让座司机情绪之下停车7分钟,等待人们的“觉醒”,尽管这位司机的初衷和用意是好的,意在唤醒人们的道德良知,但这种做法欠妥,是一种名副其实的“道德绑架”。

据说,妇女抱孩子乘公交,稍有点良知的人都应该主动让座,一来这是起码的道德良心,属于尊老爱幼;二来,妇女抱孩子乘车

太危险,万一有急刹车,很容易造成意外。然而,不让座属于道德层面的东西,人们主动让座,体现的是一种高尚美德,理应受到赞扬;人们不主动让座,也没有过错,只能受到社会道德谴责,而司机以不开车为要挟手段,逼迫人们让座,这是对他人的一种权利伤害。

从某种程度上讲,乘客只要购买了车票,谁都有权利坐这个座位,这就是双方的一种契约。作为司机,你只有把乘客送目的地的义务,没有对乘客颐指气使的权力。道德层面的提倡并不等于强制执行,二者之间是有边界的,不能以所谓的好心侵害

其他乘客利益。

一般情况下,公交车上都设有专门的“爱心专座”,是专门照顾那些老幼病残的座位。作为年轻人,占用了这个座位,确实从情理上有点说不过去,对占座者司机可以通过协商对话进行解决,通过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,让占座者明白事理,而通过停车相要挟,显然方法不当,属于典型的“道德绑架”。

现实语境下,“道德绑架”的事情屡有发生,比如有些爱心捐款,在当事人浑然不知情的情况下,某些财会人员通过扣款的方式进行“爱心捐款”,搞得人们心里很

不爽。献爱心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,怎能强搞“拉郎配”,强行索捐?这位司机的做法与某些财会人员的做法何其相似乃尔!

作为司机应该懂得尊重他人权利,动辄以停车相要挟,有时候往往会把事情搞砸。如果大家都能较起劲来,就是不让座,难道你这个司机就永不休止地停下去?如此,又把乘客的权利置于何种境地?通过协商对话,效果往往会更好,既尊重了他人的权利,又能使妇女和孩子得到妥善安置,何乐而不为?这样的“道德绑架”使不得。

李红军

“豪华衙门”戴“贫困帽子”无异于掩耳盗铃

戴在“豪华衙门”之上的“贫困帽子”,犹如一个人的穿着打扮,看起来极不相称。不同的是,衣服搭配错了无非被人归到审美能力上,而这种“穷”“奢”通吃、自相矛盾的做法,其实是为了既要国家扶贫政策的优惠和支持,又贪图安逸享乐,不仅造成不良社会观感,也是极易遭到干部群众反感和质疑的。

当前,特别是对照中央“八项规定”要求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,这样的极不相称尤显突出。对权力缺乏监督是导致“穷县富衙门”现象的制度原因。海宁市既然能被认定为“国家级贫困县”,足见其经济发展的落后。然而,在这样一个经济落后地区却出现了“再穷不能穷衙门”的怪现象,这并非是个例。近年来,我国各地豪华办公楼竞相崛起,屡禁难止,背后折射出的是当地政府对于国家的扶贫资金该怎么花、纳税人的钱该怎么花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有效的监督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,就是要用制度这个利器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,从制度层面为权力运行设立边界线,从而保证政府权力公正、高效、有序运行。

看似自相矛盾的行为,其实是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现实写照。对于公职人员的办公用房,不但政府早有相关规定,而且中央正在清理整顿超标办公用房。海宁市不仅无视国家规定如数,甚至还顶风而上,这种行为背后所隐藏的思想根源不容忽视。在某些领导干部的心目中,房子小了,自己没有面子,衙门小了,政府没有面子,既不脱贫,无关面子,自己有没有钱才是“面子”,这种把“面子”和“里子”本末倒置的想法十分危险。在一些地方,建豪华衙门无一例外地都被冠以改善办公条件之名,美其名曰树立政府形象,改善经济发展环境,其实这只不过是掩耳盗铃式地自欺欺人罢了,小聪明背后掩盖的是贪图享乐的心理和对奢靡浪费的向往,急需正本清源。

前不久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,小康不小康,关键看老乡。中国要强,农业必须强;中国要美,农村必须美;中国要富,农民必须富。农业基础稳固,农村和谐稳定,农民安居乐业,整个大局就有保障,各项工作都会比较主动。从“豪华衙门”戴“贫困帽子”可以看出,一些党员干部还没有认识到“三农”工作的重要性,还停留在豪华衙门里一杯清茶、一根烟的空谈。 宋华

浙江大学党委常委、副校长褚健因经济问题,被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立案调查。褚健2005年任浙大副校长,协助校长负责人事、离退休、学校企业工作,分管浙大的人事、后勤集团以及浙大下属的企业——圆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。

浙大副校长落马为何令人唏嘘?

继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、四川大学副校长安小予落马后,浙大副校长褚健被批捕,这意味着反腐风暴正在高校刮起。与蔡荣生、安小予落马引起的舆论狂飙相比,褚健的落马引来了不少唏嘘声,比如有网友感叹,“可惜了,很有才华的一位学者,还记得当年一个饭桌上对你的那一头银发。”“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,体制的牺牲品。”“惊闻浙大副校长褚健被批捕,心中怅然,竺可桢老校长倡导的求是精神还存在吗?”种种言辞,不一而足,皆表达了痛惜与惋惜。

褚健何许人也?竟惹得众人等如此抒情。原来,褚健果真是人才,称得上少年得志,青年得意,中年得势。1978年,15岁的褚健考入原浙江大学化工系工业自动化专业,1992年,29岁的褚健成为国内高校第一个工程中心——工业自动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副主任。次年,年仅30岁的褚健成为浙大的正教授。2005年,时年42岁的褚健任浙大副校长。如果单是履历耀眼还罢了,关键是褚健并非浪得虚名之辈。他曾不止一次入围中国工程院院士评选。1993年,浙江大学工业自动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创建了中控科技的前身——浙江大学工业自动化公司,褚健是创始人之一。公司刚刚成立时,国内自动化行业基本被国外公司垄断,但中控的崛起打破了这一局面。如今,中控集团拥有4000多名员工,2012年产值超过30亿元,并制定了国内自动化行业的第一个国际标准。

既有学术造诣,又能将产学研结合完美,褚健如果不犯事,想必会有更华丽的前景,给出更重要的科研成果。然而,法不容情,功不能抵过,曾经的贡献再厚实,只要犯事就应该受到法律制裁,这一点毫无疑问。除此之外,褚健的落马难道不值得深思?有知情人称,褚健一直是浙大本土正能量派的代表。记忆犹新的是他给我们演讲为国家复兴担起责任……坏就坏在欲望,高校的产学研结合到上市以及资产并购,十分可惜。”“褚健,打开了欲望之门,却不收敛,容易跌入深渊。具体到褚健,报道称,褚健这次事发可能与中控科技涉嫌掏空浙大海纳资产的旧事有关。诸多媒体都曾集中报道过浙大海纳公司上市后,劣质资产被掏空,并试图包装后再上市一事。

不妨作一假设,如果褚健老老实实地做学问、搞研究,是否有今天的“劫难”?如果不是学而优则仕,他安于实验室,也许不会落马。现在有一种值得商榷的现象,一些学者学问做得好,相关学校或部门往往通过任命他们担任校领导,来显示对他们的重用,仿佛不评个官半职,就对不起这些学者似的。其实,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适合做官,都有能力当好领导。学问是学问,仕途是仕途,两者并非不能结合,有的人结合得很好,但不少学者有专长的人被评以要职,结果自己的专长废弃了,仕途也摔破了,殊为可惜。褚健落马的真相当待还原,但让他不少人倍感可惜,足以说明他的上升与下落是一个金钱解剖的标本。 王石川

在史上最难就业季,“事业单位招聘4人,3人是领导子女”此类的新闻最让人揪心。即便这不是“新闻”,而是2008年的“旧闻”被人翻了出来。现代快报日前报道称,徐州淮海战役烈士纪念馆管理局于2008年招聘了4名讲解员,其中有3人的父亲都是当时局里的副局长。

招聘要不要问“爸爸去哪儿”

虽然难说是一个萝卜一个坑,但是四个坑有三个萝卜也并不逊色。如果我们把这一事件与当年轰动一时的湖北利川“萝卜招聘”事件相比,其亮点更为突出。其一,利川招聘中,一人为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,一人为南京大学研究生,都是名校毕业的“骄子”,并不完全是李刚之子之类的“衙内”,徐州事件中,被招聘者好像并没有如此骄人,甚至还因为专业不对口遭遇诟病。其二,利川事件中的父母也只是本单位的“股长”,“爸爸团队”的风光远不如徐州的三个副局长。

对于如此怪相,公众当然有权利质问“爸爸去哪儿”。不过,与以往质问查处反省不同,相关部门调查后最终认定,这次招聘是按正常程序进行的,没有违规。其实,媒体与公众大可不必质问所谓的“非正常程序”是什么,只需要问问“正常程序”是什么。如果在正常程序与非正常程序之间,双方不能达成默契,一人认为是鹿,一人认为是马,那这不是缺程序,而是缺基本共识。

正常程序是,依照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人事部《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》第27条规定,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需实行回避制度。在今年二季度新闻发布会上,人社部表示,要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中严格执行回避制度。在中国吏治的历史中,汉朝开始便有了严格的亲属回避、籍贯回避、职务回避和考试回避。徐州事件中,除去籍贯回避,当事人在另外三项回避制度中,都有越线的嫌疑。

当然萝卜招聘事件一直时有发生。问题在于,招聘回避有制度,但没有制度化。当下,亟须贯彻《公务员回避规定》和事业单位回避制度,将针对新进公务员、事业单位人员的“家庭背景”数据分析进一步细化、制度化。也就是说,招聘之前要问问“爸爸去哪儿”,招聘之后,拔出萝卜必须带出泥,而不是让警察盯上曝光者。否则,在公务员中混进了诸多世袭的“铁帽子王”,“萝卜招聘”成了“萝卜开会”,这支队伍蜕化为没有战斗力的八旗子弟也就为期不远了。 付瑞生

让“最严标准”捍卫奶粉安全

日前,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《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许可审查细则(2013版)》。新版细则从原辅料把关、产品配方管理、婴幼儿配方乳粉分段、生产工艺、过程控制等9方面内容进行了重新规范,相比以往,要求更高、措施更细、标准更严,成为目前食品生产企业中最严格的许可标准。

祭出“最严”利剑,是近期食品安全领域的政策导向。刚刚落下帷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,能不能在食品安全上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交代,被提到考验执政能力的高度。用最严谨的标准、最严格的监管、最严厉的处罚、最严肃的问责确保“舌尖上的安全”,力度空前。在此背景下,奶粉业新版细则的出台,正是贯彻“最严”思路,剑指奶粉安全这块焦点和难点于一身的硬骨头。

尽管已经过去了5年多,但三聚氰胺事件的后遗症依然没有完全消除。在那次危机冲击下,国产奶粉一片愁云惨雾,纷纷陷入信任“冰点”,成为食品行业的痛中之痛。直到今天,还有不少国内消费者跑到香港和欧美国家去抢购奶粉。从百姓健康到企业公信再到品牌信誉,食品安全确实“伤不起”,其修复代价之高,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。

正如农村工作会议指出的,食品安全是“产”出来的,也是“管”出来的,抓住了企业和监管这两大关键,就抓住了食品安全问题的要害。

从这个角度看,新版细则力图以最严标准倒逼企业生产的全流程优化升级。从把好生产规范(GMP)作为硬杠杠到对婴幼儿配方乳粉进行分段管理,细化各种工艺流程要求;从要求主要原料为生牛乳的企业,应有自建自控的奶源基地,到严格生产环境要求,实行企业质量安全授权人制度和质量安全追溯,这一系列新规,鉴于以往教训和社会呼声,对生产管理过程实现了全覆盖,确保用最好的原料、最好的管理,生产出安全优质的婴幼儿奶粉。

除此之外,提高准入门槛、严格许可条件,以整个行业标准的提升加快“驱逐劣币”,使真正有资质、有能力企业进入市场,这恐怕是治理思路上的一个创新。这既是国际通行做法,也是迅速而大幅提升奶粉企业食品安全生产水平的现实需要。当然,只管住企业还不够,监管方面也需要最严格、全覆盖的制度设计,生产和监管的透明度更高需进一步提高。有过得硬的品质、有动真格的监管、有看得见的变化,消费者的信心就会逐渐提振起来,国产奶粉也将以诚信和努力赢得市场的肯定。 陆文江



生,还是不生?

差之毫厘,谬以千里,这样的剧情在广西武鸣上演。武鸣县的罗先生夫妇得知怀上二胎的喜悦没多久,就被计生干部告知准生证系“错发”,准生证随之被收回。窘境由此而来,腹中胎儿还能不能出生?一张自摆乌龙准生证,究竟该由谁来承担后果? (12月21日 新华网) 李军文 焦海洋 漫画

陈光标堆钱跟经济普查没半点关系

“让标哥的钱包出来透透风,见见阳光。经济普查,人人有责;经济普查,从标哥查起。”12月24日夜,南京,在临时搭建的数米高的露天红帐内,陈光标站在一番番百元人民币堆出的“钱桌”旁,指着身后、左、右的三面“钱墙”说:“我就是要用这种夸张方式,让更多人关注、并积极参与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。”

无论是在灾区直接给灾民发放现金,还是提议在人民币上印上论语,陈光标与人民币的组合,公众并不陌生。在引发众多眼球效应的同时,公众心中的陈光标也几乎成了“暴力慈善”的代表。这次,陈光标又一次沿袭了其高调风格。拿出以吨计的人民币宣传经济普查,

又遭网友质疑是炫富、炒作。

诚然,作为一名企业家,行为只要未逾越法律,就是其个人权利。更何况,陈光标解释晒钱缘由是“引领更多企业家一起晒钱”,迎接经济普查。问题是,经济普查是对国民经济的摸底,既不牵扯纳税,也无关财富来源,跟晒钱、晒财富清白半毛钱关系都没。配合经济普查,要的是遵守法规,而不是靠道德表演,搞晒钱秀。陈光标的做法更像是经济普查的歪曲,其负面宣传效果恐怕远远大于积极价值。

陈光标摆出16吨百元人民币,有一种令人生理反感的粗鄙。不管陈光标做过多少善事、好事,不

管他的初衷多么高尚、善良,他都没有权力用粗俗来玷污公共空间,用恶俗糟蹋公序良俗。任何人也不能打着某种看似正义的旗号,在公共空间中为所欲为。名人要做“表率”,没啥问题,可别总沉迷于道德表演带来的自我满足中,而忘了社会心理承受范围。过犹不及,富人动辄拿“钱”开涮,向公众显摆自己多么土豪,难免会刺激不少人的观感与心理。

陈光标在经济普查的倡议中引用先辈的话称,要量入为出。无论是从陈光标个人计,还是社会影响计,希望他的行为,也能够“量入为出”,适可而止。这一次,标哥做的实在太过了。 朱昌俊

节能环保的历史欠账亟待还清

12月25日,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,就《国务院关于<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>实施中期评估报告》作出说明。《纲要》提出

的24个主要指标大多数达到预期进度要求,少数指标已提前完成目标。但能源消费强度、二氧化碳排放强度、能源消费结构、氮氧化物排放量等4个节能环保方面的约束性指标实现进度滞后。

徐绍史在说明中指出,节能环保指标拖了十二五规划后腿,是经济增长速度超过预期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较慢、能源结构优化调整进展不快、部分企业减排力度不够等原因所致。而从这些原因映射出去,更需要追索的是,经济增长何以超速,旧的经济模式何以难以扭转,企业行为何以不能纠正?在节能环保问题已然上升为公共挑战

的今天,更需从深层面找到答案。

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的坚硬外壳之所以不能打破,当然有宏观经济形势的客观原因。十二五规划启动的2011年,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主要经济体,都处于抗击金融危机刺激政策周期。流动性的大量释放,习惯性地对旧的产业结构形成了支持,催生了三高产能的大肆扩张。同时,由于银行业信贷结构没有优化,国有企业得到了更多的优惠。地方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的依赖度也前所未有的加强。在资金和监管双宽松的格局中,一些地方国企和民营实体中的高污染、高排放大户一样,共同成为主要污染源,使得环境资源再遭损害。

短期的财税、就业利益既然而得,需要支付成本的产业结构调整自然被置于次要位置。各地一度出台的大规模产业振兴计划,少有新经济的实际部署,多数是

传统项目的大量复制。由此导致产业转型在许多时候,仅仅在政策表述上得到了强调,而无法转化为具体行动。

出于同样的考量,唯GDP论在这一轮产业扩张中,不是被淡化而是被强化了。尽管其间也曾实施过拉闸限电等强制性的节能措施,但生产活动中的单位能耗并未得到优化。系统性的节能应用固然难以全面展开,行政式的节能措施也在GDP考量下遭遇了强大阻力。

节能环保的历史欠账,总是要还的。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,淡化GDP考量,加大去库存化进度,实施最严格的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等,均已上升为最权威的政治意志。民意和政策的共同诉求,已为节能环保领域还债创造了环境。事实上,这笔欠账也已拖欠不起了。 徐立凡